

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第 56 卷
总第658期

3

Mar 2024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

投稿须知

(一) 本刊自 2016 年起启用在线投稿系统, 以“学术月刊”网站 (<https://www.xsyk021.com>) 作为接受投稿的主要渠道。

本刊的栏目分为: (1) 哲学; (2) 经济学; (3) 文学、艺术学、美学; (4) 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 (5) 政治学; (6) 法学; (7) 社会学; 若不能确定板块, 请选择“(8) 综合通联”板块。

(二) 来稿字数以 15000~20000 字为宜, 并附带中文摘要 (300~400 字)、英文题目与摘要 (约 200 个单词)、中英文关键词 (3~5 个)、作者简介 (包括姓名、工作单位、学位、职称、研究方向等)。

(三) 根据国家标准 (GB/T 7714-2015), 结合本刊实际, 引文标注采用当页脚注形式, 用阿拉伯圈码数字 (①②③……) 统一编码。

(四) 本刊对来稿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及编辑部三审。稿件正文中请勿出现作者个人资讯, 作者从投稿之日起超过一个月未接到采用通知, 可自行处理稿件。

(五) 本刊有权对来稿做文字性删改, 有特殊要求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六) 来稿须为作者本人原创性作品且从未公开发表, 并确认不存在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违背研究伦理, 以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内涵的具体解释, 请参照《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 (CY/T 174—2019)》。向本刊投稿, 即视为作者承诺, 如有前述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愿意承担一切相应的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

(七) 作者向本刊投稿或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 即授权许可本刊对稿件享有长期专有使用权, 包括本刊享有独家发表、出版、复制及发行等权利, 且本刊有权独家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作者稿件及本刊全文。稿件一经被采用, 即付稿酬, 寄送样刊。与前述相关的著作权授权专有许可使用费包含在一次性支付给作者的稿费中。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同意接受前述对本刊的著作权授权专有许可。若不同意前述著作权授权专有许可的, 作者应在来稿时作出明确书面说明, 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八)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 010-63098272。

学术月刊编辑部

学术月刊

第56卷 2024年3月号

总编辑 金福林 副总编辑 盛丹艳

主管主办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出版 《学术月刊》杂志社
编辑 学术月刊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乙)
邮编 200020
电话/传真 021-53060399 53061937

印制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4年3月20日
国内总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北京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编辑 沈敏 王胜强 张曦 周奇 朱颖 邱小航 编 务 梁思雯 徐章杰
英译校订 林骧华 英译责任校对 张曦 特约校读 王瑞祥 装帧设计 肖晋兴

ISSN 0439-8041 发行代号: M291
CN 31-1096/C 邮发代号: 4-72 定价: 48.00元/册

本刊网站 <https://www.xsyk021.com>

通联邮箱 xsyk021@163.com (不接受投稿)

Academic Monthly

学术月刊

CN 31-1096/C

ISSN 0439-8041

第 56 卷

总第 658 期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戎	马怀德	王元骧	王为松 (主任)	王利明	王浦劬
王铭铭	王逸舟	韦 森	叶 朗	田国强	权 衡
朱苏力	任小文	刘 伟	孙周兴	李友梅	李伯重
杨光斌	肖 滨	吴晓明	何勤华	汪丁丁	沈国明
张 军	张文显	陈 来	陈平原	陈尚君	陈明明
陈思和	金福林	周振鹤	周晓虹	赵鼎新	袁志刚
倪梁康	桑 兵	桑玉成	葛兆光	景跃进	童世骏
解 超					熊月之

3

Mar 2024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

知识生产：概念与方法

- 5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转化：提炼标识性概念的视角 段博 程霖

- 20 何以归家：现代性的救赎 孙向晨

- 37 孟子义利之辨的三个层面 梁涛

- 44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文化哲学阐释路向

——论拉布里奥拉、蒙多尔佛、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王馨曼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 53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政治经济学 刘守英 熊雪锋

- 70 精准扶贫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 朱平芳 方顺超

- 84 战略思维流变与美国霸权走势相关性分析 张一飞 吴白乙

- 96 数字时代的有为政府：公共治理的视角 何启志 彭明生

- 107 比例原则目的正当性审查方法新论

——一个融合法经济学、商谈理论的视角 翟翌 金龙君

社会理论与本土经验

- 120 社会学本土化与定量研究的再思考 谢宇
- 129 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家庭特征的转变 於嘉 何雨辰
- 143 儒家的文化范式
——基于中美跨文化比较视角的考察 杨一纯 张春泥 孙妍

-
- 155 数字时代我们如何见证 赵静蓉
- 165 胡适：“有实无名”的中国现代诠释学探索者 张凌雁
- 174 作为“神契”的 Correspondance：波德莱尔的应和思想新释 妥建清

-
- 184 清至民国长江入海口沙洲坍涨及其开发
——以江阴常熟为中心 王日根 江俊皓
- 196 新文化运动与出版物的勃兴 桑兵

访谈

- 212 社会科学研究的自觉
——谢宇教授访谈 谢宇 竹影

5	DUAN Bo, CHENG L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 Perspective of Refining Iconic Concepts
20	SUN Xiangchen Why and How to Return Family: The Redemption of Modernity
37	LIANG Tao Mencius'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44	WANG Xinman The Interpretation Direction of Italian Marxist Historicist Cultural Philosophy —— On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Labriola, Mondolfo and Gramsci
53	LIU Shouying, Xiong Xuefeng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Theoretical Creation
70	ZHU Pingfang, FANG Shunchao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Labor Mobility: Policy Treatment Effects and Mechanisms
84	ZHANG Yifei, WU Baiyi A Critical Analysis of Evoluted American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U. S. Hegemony
96	HE Qizhi, PENG Mingsheng A Proactive Government in the Digital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
107	ZHAI Yi, JIN Longjun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Justification Review Method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 A Perspective that Integrates Law, Economics, and Negotiation Theory
120	XIE Yu Rethinking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ology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129	YU Jia, HE Yuchen Chinese Family Transition: A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43	YANG Yichun, ZHANG Chunni, SUN Yan The Confucian Cultural Paradigm ——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U. S.
155	ZHAO Jingrong How to Witness in the Digital Age
165	ZHANG Lingyan Hu Shi: An "Actual yet Unentitled" Explorer in Modern Chinese Hermeneutics
174	TUO Jianqing Correspondance as "神契": Redefinition on Baudelaire's Correspondence Thought
184	WANG Rigen, JIANG Junhao The Collapse and Development of Sandbars at the M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 Centered around Changshu and Jiangyin
196	SANG B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Flourishing of Publications

儒家的文化范式

——基于中美跨文化比较视角的考察

杨一纯 张春泥 孙妍

摘要 中西方文明和国别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是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现代化理论预测现代化过程中各国传统价值观会被现代价值观所取代，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价值观趋同。文化相对主义和本土心理学则强调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持续性和推动作用。之前对中国价值观变迁的研究更多是基于思辨性的分析，或使用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的测量工具，缺乏具有本土测量视角的跨文化比较量化研究。使用基于儒家文化开发的本土化测量工具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进行比较，发现：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美国人相比仍保有明显的文化独特性和儒家文化范式，尽管儒家传统价值观的某些维度已有所衰退。据此，应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关系，并重视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研究价值，以跨文化视角和量化方法探索中国民众价值观的变迁。

关键词 儒家文化 价值观 跨文化比较 量化工具

作者杨一纯，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71）；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北京 100871）；孙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4)03-0143-12

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转型，不仅体现为社会结构和体制变革^①，也投射到中国民众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变化上。价值观（values）是一种系统信念结构和对抽象事物的稳定评估体系，能指导个体行动，因而被视为影响人类行动轨道的“扳道工”^②。价值观的形成深受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也被视为各国选择不同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来源之一。^③ 因此，不同国别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项重要议题。

一般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人价值观的基石并长期引导其行为规范，使之体现出关系取向、伦理本位、差序格局的特点。社会学家金耀基和心理学家彭迈可（M. H. Bond）将这套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典型价值体系

①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② Rokeach M., ed., *Understanding Human Values: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Hitlin S., Piliavin J. A., “Values: Reviving a dormant concep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0, 2004, pp. 359–393;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9 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森·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年。

和行为法则统称为“儒家文化范式”(the Confucian paradigm of man)。^① 儒家文化在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费孝通先生曾称之为“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②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围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究竟如何变迁。对此,存在两种竞争性假设:一是由现代化理论衍生出来的价值趋同假设(或杨国枢提出的“心理趋同假设”)。^③ 这一假设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价值观会逐步脱离传统,转向更为包容、理性的现代型价值观,并随着现代化制度的全球扩张带来各国民众价值观的趋同和跨文化心理差异的消除。基于此,有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经历的一系列转型(如经济转型、全球化等)会极大冲击儒家文化的根基,使之不再主导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④ 另一种竞争性假设则来自“文化相对主义”,这一视角认为并非所有社会都会向西方文明靠拢,各国的文化独特性会长久影响其国民价值观。^⑤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儒家传统价值观仍在引导当代中国人行为方向上发挥重要作用。

上述两种观点之争在中国集中反映在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否仍保持以儒家文化范式为特征的独特性的问题上。目前学界的讨论很大程度是基于思辨性研究,证据大多依赖于个案,量化证据仍相对不足,也缺乏跨文化比较。而回答文化独特性的问题需要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方能探知哪些价值观为中国社会特有,哪些为普适性的;在跨文化比较上,量化方法提供了一致性和可比性的标尺,可测量和检验差异的维度与程度。

中国民众价值观量化研究的核心在于选取恰当的测量工具。然而,以往研究大多简单移植基于西方社会情境设计的量表^⑥,很大程度上局限了研究视野。首先,价值观是特定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的产物,深具民族性和特殊性。例如,儒家文化的家本位主义、君子之道等观念长期植根于中国人行为体系中,但这些在西方量表却鲜有体现。因而,使用西方测量工具难以触及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内核,更无法建构一套反映民众真实价值观变迁的知识体系。第二,西方量表将西方一般社会形态作为参照标准,中国与之对标难免削足适履,在学术讨论上缺乏话语权,难以发挥中国对相关议题的独特贡献。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主张,认为“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⑦,在“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⑧,并要“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解释文化,抓住比较研究,懂得各国、各地区文化为什么不同”^⑨。基于文化自觉的立场,探索民众价值观变迁的研究也应努力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拟定跨文化的分析框架。

有鉴于此,本文使用一套基于儒家文化设计的价值观量表和最新的中美跨文化数据对中国民众价值观进行比较,试图回应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否仍存在明显的儒家文化范式?如果存在,这一范式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以儒家文化范式为参照系,中西方的价值观差异体现在哪些维度?本文不仅提供了反映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经验资料,也是一次文化自觉的实践和对社会学本土化路径的探索:首先尝试剖析现代化理论下价值趋同假设的局限性,回答为何关注儒家文化;然后通过回顾儒家价值观测量工具的发展脉络,回答如何测量儒家文化;继而呈现调查资料,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儒家文化价值观中的不同表现。

① King A. Y., & Bond M. H., "The Confucian paradigm of man: A sociological view," in *Chinese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Academic Press, 1985, pp. 29-45.

②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2页。

③ Yang K. S., "Will Societal Modernization Eventually Eliminate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in M. Bond Ed., *The Cross-Cultural Challenge to Social Psych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8, pp. 67-85.

④ 翟学伟、屈勇:《中国人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的一致与冲突》,《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⑤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森·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⑥ 高海燕、王鹏、谭康荣:《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⑦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参见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⑧ 费孝通:《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参见《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⑨ 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参见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第2页。

二、现代化变迁下的价值观趋同假设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社会变迁。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科学对现代化的研究一度达到顶峰,并形成了用于解释和预测不同国家变迁模式的现代化理论。古典现代化理论认为,尽管前工业社会之间差别巨大,但在现代化洪流中,所有社会都会朝向“现代社会”模式发展。^①这种模式趋同不仅表现为科技作为经济发展内驱力、职业分工专业化、组织管理科层化、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政治民主化、家庭核心化等方面^②,还表现为文化的现代化,即价值观趋同。杨国枢将不同社会中的人在现代变迁过程中逐渐趋于一套共同现代心理与行为特征的现象称为“心理趋同假设”(psychological convergence hypothesis)。^③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探讨现代化变迁下跨文化价值观的趋同。英克尔斯(A. Inkeles)开创了现代化历程下“社会变迁与人的变迁”的研究先河。^④他对6个发展中国家民众心理变迁的研究发现,社会现代性会鼓励人们逐渐在价值观上呈现相似特征:例如对创新和变化的开放态度、理性计算和契约精神、面向未来、守时惜时等;因为这些特质能帮助个体适应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他所总结出的12项现代型人格被视作评判一个人是否符合现代人的标准,也成为后续的社会心理学家继续探索个人现代性的基础。^⑤

英格尔哈特(R. Inglehar)是探讨现代价值观变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研究了多个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的民众价值观,将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发达工业社会价值体系变迁的方向分别总结为“传统权威—世俗理性”和“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⑥传统权威是指对宗教等集体权威的遵从,世俗理性则指向开放、自主、独立。物质主义强调经济稳定、物质保障及权威性政府,而后物质主义更重视环境质量、生活归属感、自我表达和政府参与。他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构建了世界文化价值地图,发现从非洲、拉美、南亚到东欧、东亚社会的价值观呈现了从传统权威到世俗理性价值取向的变化,而从上述社会到欧洲和北美则呈现了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化。各国在文化地图上的分布与经济繁荣程度相一致,所以他预测发达工业化国家最终都会趋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除此之外,霍夫斯泰德(G.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也形成了类似的观点,其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四个维度来归纳和解释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模式,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个人主义趋向呈正相关,与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回避呈负相关,因此不同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高度一致也会促使价值观最终向同一方向靠拢。

基于西方量表,上述价值观趋同假设在跨文化比较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证据^⑦,但它仍存在局限性。一是它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烙印,假定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据此形成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分类取向,忽视了文化的复杂内涵。例证之一是“个人/集体主义”的划分试图将东亚国家都视作集体主义国家,但实际上中国人的价值观难以尽归于“集体主义”,而更多表现为“家庭集体主义”^⑧,或差序格局——围绕以“己”为中心发展出不断伸缩变化的社会网络——对他人的态度和行动倾向性取决于对方与“己”关系的

① 杨国枢:《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能否同时并存》,参见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Thornton A., "The developmental paradigm, reading history sideways, and family change," *Demography*, 38(4), 2001, pp. 449-465.

③⑤ Yang K. S., "Will Societal Modernization Eventually Eliminate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in M. Bond Ed., *The Cross-Cultural Challenge to Social Psych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8, pp. 67-85.

④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⑥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⑦ 参见 Flanagan S. C., "Value change and partisan change in Japan: The silent revolution revised," *Comparative Politics*, 24, 1979, pp. 253-278; Gusfield J.,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isplaced polar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 1967, pp. 351-462.

⑧ 翟学伟:《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结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终结》,《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亲疏远近。此外,普适性假设亦带来测量问题,极易产生曲解。英格尔哈特对“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操作化方案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前者被定义为生理性需求,如民众对经济和人身安全等的考虑;后者则被定义为对自由与归属感等的考虑。但同一题项在不同文化中的理解也可能呈现多样性,例如“建设更有人情味、更人性化的社会”这一测量归属感的后物质主义题项在日本社会被解读为“集体束缚个体”,反而更受物质主义者认可。这体现出“马斯洛认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需求次序似乎只反映了一种西方视角”^①,从而导致使用西方设定的“普适性文化框架”来解释跨国差异极易产生生搬硬套的研究误区。而要真正认识一个文化,更应从其自身出发寻找“被发掘出来的比较架构,而不是从外强加的比较架构”。^②因此,上述西方价值观框架是否具有广泛适用性值得反思。后期英格尔哈特和贝克也对其理论不断进行了修正,意识到民族文化遗产(如国家宗教体系,文化体系)对一国价值观的塑造作用。^③

趋同假设的另一问题是将传统和现代视为完全对立的两极,且认为两者呈现一种单向线性发展关系,忽视了不同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早期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实现心理趋同的过程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同一国家内持有现代价值观的民众比例增多并逐渐取代传统价值观;二是现代化高度发展的国家间价值观渐趋一致。这似乎暗示摒弃传统价值观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仍受到不少传统文化特征的影响。不同于西方的渐进路线,中国现代化呈现出高度“时空压缩”的特点,表现为传统观念尚未消失,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观念却已生长出来,后者并未取代前者,而是与前者共存、叠加和结合,形成一种高度交融的状态。^④一些使用心理现代性和传统性量表的研究发现,现代性的个人主义成分(如自力更生/独立)与传统性的集体主义成分(如服从权威/孝顺/祖先崇拜)之间互相独立,中国人价值观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上可能呈现“双高”局面。^⑤此外,传统价值观对现代化是阻碍还是推动亦值得商榷。文化相对主义强调传统价值观的独特贡献,杜维明曾指出,“儒学事例表明,一些亚洲价值观,例如同情心、分配上的公正、义务感、礼仪、公心、群体取向等,也是可普遍适用的现代价值观”。东亚国家崛起的现实经验证实,儒学传统恰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腾飞的关键文化因素。^⑥这启发我们,“传统—现代”两者的关系可能不是非此即彼,需要将两者的价值体系分离进行评估。

综上,趋同假设的理论立场需被重新反思。现代性不是仅有西方一种版本,价值观的变迁亦然。传统性与现代性不是处于一个连续的系统两极,或是单向继替关系,而可能长期并存。^⑦正如杨国枢所言,对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探索不应是“普同性”的,重心应回归到“本土性”,即探索中国人在哪些方面的人格特征和价值观与外国人不同?这些独特性哪些能够适应于社会变迁,哪些则不能?^⑧上述对趋同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引发了对儒家文化范式的相关研究。

三、儒家文化范式与测量工具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以外的文化范式得到了广泛重视,儒家文化的实证研究发展起来。对儒家文化范式的研究动机来源于两个学术阵营。一方面,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他们忽视了非西方文化对心智模式的塑造,例如霍夫斯泰德曾指出:“西方文化视角的局限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自给自足,只有那些不同文化心

①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第151页。

② 杨中芳:《中国人真是“集体主义”的吗?——试论文化、价值与个体的关系》,《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③ Inglehart R., Baker W.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65, 2000, pp. 19–51.

④ Chang, Kyung-Sup, “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Obfuscated Family Crisis in East Asia,” In Ochiai, Emiko & Leo Aoi Hosoya eds.,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imate and the Public in Asian Modernity*, Leiden, Boston: Brill, 2014.

⑤ 杨国枢:《中国人的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概念与测量》,参见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

⑥ Hofstede G., & Bond M. H., “Th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6(4), 1988, pp. 5–21.

⑦ 杨国枢、黄光国:《个人现代化程度与社会取向强弱》,《“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2期。

⑧ 杨国枢:《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能否同时并存?》,参见杨国枢:《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的观点》,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

智模式的人能帮助我们发现自身局限性。”^① 另一方面,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形成了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其早期代表人物包括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黄光国、叶启政,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等。他们意识到二战后,中国研究往往盲目套用西方范式,压抑中国自身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缺乏“本土契合性”。^② 进而提出要探索心理学的“本土进路”^③,即从中国文化和历史脉络中探索广泛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心理及行为现象^④。由此,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价值观的研究核心。^⑤

对儒家文化的实证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特定文化核心概念的研究,如孝道、面子、恩仇、中庸等^⑥;还有一类则是对文化整体观念体系变迁的研究。本文关注后者,侧重于对当代中国人价值取向的一种脉络性了解。恰当的测量工具对儒家价值体系的实证研究必不可少,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1973年由彭迈可领导的中国文化链(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团队主持的中国价值观调查(Chinese Value Survey)。在该调查中他们设计了一套问卷测量工具(后文称为“儒家价值观量表”),主要基于儒家价值观的形式性价值(formal virtues)所设计^⑦,能相对稳定地测量不受特殊时代影响的整个儒家体系的核心概念。为此,该团队邀请中国专家用中文列出至少10项能代表中国人价值观的清单,在消除同义和冗余词汇后,最终形成了包括40个题项的量表。从今天来看,这40个题项主要对应儒家文化的经典概念,重点围绕“五常”(仁义礼智信)展开。李泽厚认为“仁义礼智信”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⑧,黄光国认为“五常”是支撑华人社会运作的先验形式架构,广泛存在于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⑨,是华人与西方社会根本差异所在。基于此,本文将解析儒家价值观量表如何测量“五常”:

“仁”是“五常”之首,在儒学中被视为一种涵义广泛的道德范畴,其本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动。但儒家所主张的“仁”是有差等的爱,而非一视同仁。^⑩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第二十章》),这是指“仁”的起点首先是对父母的孝敬,继而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确定对他人的态度。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儒家主张在这些基本社会关系中,扮演父、兄、夫、长、君等角色的人,应当按照慈、良、义、惠、仁的原则行事,而扮演子、弟、妇、幼、臣等角色的人,则应当依照孝、悌、听、顺、忠的原则尽到自身义务。儒家价值观量表中对“仁”的测量体现为“孝(服从父母,尊敬父母,尊崇祖先,赡养父母)”“忠于上司”“爱国”。需要强调的是,“五伦”和“十义”的界定在儒家文化中都是一种“相互伦理”(reciprocal ethics)^⑪,即关系双方都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可延伸为儒家文化中对“关系的相互性”或“回报性”的强调,体现为儒家价值观量表中的“恩威并施”,“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等题项。

“义”本指合适,适宜的行为方式,“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第二十章》)。儒家文化强调互动中的尊卑等级关系,“义”指根据这种尊卑、上下关系而确立的适宜行为方式。儒家价值观量表中的“尊卑有序”测量的正是此意。此外,“义”也可解读为正义性,既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事。黄光国等将“义”按照“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两个类型进行阐述^⑫,前者是指群体成员认为应当按照何种程序决定资源分配方式,即根据“尊尊原则”确定谁是资源分配者;而后者是指群体成员认为应当如何分配资源,即在确

①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8(2), 1987, pp. 143–164.

② 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关问题》,《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

③⑦ Yang K. S., “Indigenized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of selected Chines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4), 2006, pp. 298–303.

④ 杨中芳:《中庸研究与华人本土心理学》,《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14年第2期。

⑤ 黄光国:《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由文化“复建”到文化“复兴”》,《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5期。

⑥ 杨国枢主编的《中国人的心理》收录了黄坚厚、金耀基、朱瑞玲、黄光国、文崇一等人对孝道、人情、关系、报恩与复仇、面子、耻等概念的分析。论文《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收录了他本人和合作者关于孝道、家族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则收录了中庸的专题研究。

⑧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19年,第6页。

⑨⑫ 黄光国:《儒家仁道的演化系谱》,《国际儒学(中英文)》2023年第1期。

⑩⑪ 林端:《全球化下的儒家伦理:社会学观点的考察》,参见黄俊杰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2–126页。

定资源分配者之后,由其根据“亲亲原则”决定资源分配方式。从“义利论”出发,儒家文化认为对“富”和“贵”的取得应当建立在“义”的约束下。^①儒家价值观量表将这些价值操作化为“正义感”“廉洁”等题项。

在儒学体系中,“礼”被视为依照“亲亲尊尊”原则所建立起的一种差序性社会秩序。^②“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第二十章》)。“礼”也延伸为一整套非成文的制度和行为规范,即“交接有礼”,体现到在社会互动情境中,即外显行为要符合“礼”的原则,以礼节之,在社会层面体现为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价值观量表中的对应测量包括“礼仪”“礼尚往来”“礼貌”“尊重传统”等。“礼”还体现到对个人修养的要求,即“克己复礼”。费孝通先生认为“复礼”是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东西方文化的关键差异之一便是西方文化强调“扬己”,而中国文化强调“克己”。^③在人际交往中,“礼”的践行还体现为“让”,对此,儒家价值观量表中所涉题项包括“谦虚”“随和”等。

“智”或“知”体现在对于“仁义礼”伦理体系的践行上。儒家文化认为只有先意识到这套伦理体系的智慧,才能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过程首先要经过“知”的步骤: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次要修身养性,遵循“君子之道”,践行“温良恭俭让”。儒家价值观量表中的“博学”“节俭”“勤劳”“耐力(毅力)”“谨慎小心”“稳重”“修养”等与此对应。践行“君子之道”也包括对于名誉、名声的重视,在量表中“面子”“贞洁”“清高”与此有关。个体在修身过程中如果违背了“仁义礼”的伦理体系,则应该感到可耻,“知耻而后勇”^④在量表中体现为“知耻”。此外,对于“君子之道”的践行还应当遵循“中庸”的原则,即不偏不倚的践行自身的原则和态度,保持中正。

“信”的本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但儒家文化中的“信”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契约性精神,体现为两点^⑤:其一,“信”不完全是指一种对等的相互性契约关系,其往往与“忠”连用,“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其所强调仍是上下、尊卑关系的礼义秩序。其二,“信”在儒学中也作为一种内化的主体性道德规范,在《孟子》《中庸》中常常出现与“诚”连用,强调“信”是一种内在善的表现和德性观念。在儒家价值观量表中这一测量体现为“信用”。

儒家价值观量表开发后得到了一定范围的应用,中国文化链团队运用这套量表在20多个国家开展了跨文化数据的采集,并首次发现了一个与西方量表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维度,即儒家工作动力(Confucian work dynamics)^⑥;东亚国家在此维度普遍得分很高,且这一价值观对解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有较强解释力^⑦。随后,杨国枢等人参考这套量表,设计了同为40道题项但表述稍有差异的传统价值观量表,用之探讨中国台湾地区电子厂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与组织行为间的关系,从中提炼出五个中国传统价值维度,分别是“家族主义”“谦让守分”“面子关系”“团结和谐”和“克难刻苦”,并发现儒家传统价值观反而利于培养现代人乐观进取的精神,以及形成社会取向及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⑧,证实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相容性或促进性。

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推进,1980—1990年代大陆也兴起了本土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当时有代表性的工作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主持的“中国人民民族性格和中国社会改革”课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组织的“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研究”等。其中,沙莲香对中国人民民族性格的研究影响力较广,她发现中国人性格中蕴含着儒家文化特质,体现在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实际人格中“仁爱”“忠孝”“中庸”“勤俭”的

① 黄玉顺:《论“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儒家“正义”概念辨析》,《东岳论丛》2021年第4期。

② 黄光国:《儒家仁道的演化系谱》,《国际儒学(中英文)》2023年第1期。

③④ 王博:《中国儒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0页。

⑤ 李祥俊:《儒家信观念的涵义演变及其社会生活基础考察》,《江汉论坛》2020年第3期。

⑥ 后来霍夫斯泰德在其文化维度理论中也吸纳了这一维度,并最终定义为“儒家长期主义”。我们在后文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因子,并延续霍夫斯泰德的命名。

⑦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87, pp. 143-164.

⑧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第506页。

重要性排序都较高。^①

上述研究均证实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持续性影响，颇具启发性和开创性，但也存有局限。第一，调查样本缺乏代表性。中国文化链团队虽采集了跨文化数据，但每个国家样本量非常小，且调查对象仅限于大学生，调查范围仅涉及中国港台地区，未涉及大陆。杨国枢、金耀基等人的本土化研究也仅限于中国港台地区和大陆极个别城市，调查对象多为企业员工等特定群体。第二，缺乏比较研究视角。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大多缺乏与中国以外社会的跨文化比较，这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可推广性和学术影响力，亦无法对中国价值观的独特性进行检验。第三，时效性问题。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研究热度近年来迅速消退，尤其是对儒家文化体系整体变迁的量化研究已近乎消失。然而，最近二十年却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转变，20 世纪的研究结论恐难反映当下中国民众对儒家文化的实际接受度。因而需要重新考察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并在跨文化比较视野下回应中国民众价值观的独特性问题。

四、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文分别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使用网络调查采集了跨文化数据。中国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联合开展的中国本土化概念的社会调查。该调查在 2022 年 9 月—11 月间通过委托国内第三方调查机构平台招募受访者，在获得受访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邀请其在手机上完成自填式问卷（self-administrated questionnaire），最终共获得了 8726 个有效样本。为了解决网络样本最初招募的受访者学历偏高的问题，我们一方面采取配额方式扩大了低学历群体（高中及以下）采样数量，以保证样本覆盖到一定规模的低学历受访者；另一方面根据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对样本进行加权，使加权后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分布与普查人口的分布相一致。美国调查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组织实施的跨文化社会心理调查（Cross-Cultural Social Psychological Suvey, CCSPS），该调查委托美国第三方网络调查平台在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实施，最终采集到 3716 名美国人的有效样本。^② 中美调查都对回收数据的质量进行了严格控制，采用了注意力测试等质量控制手段，排除了受访者回答时长过短、注意力测试不通过和答题存在前后逻辑矛盾的样本。

调查使用了彭迈可团队设计的儒家价值观量表。具体答题过程是请受访者对 40 项儒家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打分，题目表述为“这里有一些生活中重要的品质，请您根据这一品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其中 1 代表非常不重要，9 代表非常重要”。美国调查也同样采用了该团队翻译的英文版量表。当年为保证英文表述忠于中文语境和原意，该团队对翻译进行了细致的校准工作。

本文首先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在 40 个价值观题项上的评分，分别了解中美两国民众在具体儒家传统价值观题项上的差异性。其次，我们将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PCF）方法探索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并以此为参照系，比较在同一价值观维度上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性。

五、研究发现

（一）中国人和美国人在 40 个价值观题项上的差异

表 1 展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 40 个具体题项评分上的平均值、评分差值，以及根据评分差值大小进行的由高到低的排序。由于各题项评分均值不同，某些题项上存在中国人和美国人打分都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为了更好地评估两者差异，本文对两国民众各题项平均分的差值进行了标准化，使之成为-1 到 1 的指标，越靠近-1 表示美国人得分越高，越靠近 1 表示中国人得分越高，0 表示两者一致。^③

① 沙莲香：《关于民族性格重新组合的几个问题》，《社会学研究》1989 年第 4 期。
② 鉴于美国文化的多样性，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样本中排除了美国社会中的亚裔和非洲裔美国人，主要使用的是美国白人样本，这部分样本为 3716 名，亚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样本分别为 3725 人和 825 人。
③ 各题项进行标准化的公式=（中国人均值-美国人均值）/（中国人均值+美国人均值）。

表 1 中国人在美国人在不同价值观维度上的评分差异

	中国	美国	差值	差值排序
文化优越感	6.18	3.72	0.25	1
贞洁	6.09	3.72	0.24	2
尊卑有序	7.02	4.69	0.20	3
正义感	7.57	5.35	0.17	4
爱国	8.41	5.99	0.17	5
追求财富	6.92	5.26	0.14	6
知耻	7.49	5.74	0.13	7
恩威并施	6.70	5.31	0.12	8
礼仪	7.55	6.02	0.11	9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6.30	5.07	0.11	10
孝 (服从父母, 尊敬父母, 尊崇祖先, 赡养父母)	8.25	6.75	0.10	11
礼尚往来	7.61	6.38	0.09	12
清心寡欲	5.52	4.73	0.08	13
修养	7.76	6.67	0.08	14
节俭	6.85	5.90	0.07	15
团结	7.68	6.70	0.07	16
尊重传统	6.94	6.18	0.06	17
耐力 (毅力)	7.81	7.27	0.04	18
勤劳	7.85	7.34	0.03	19
谨慎小心	7.27	6.94	0.02	20
礼貌	7.95	7.59	0.02	21
适应环境	7.59	7.27	0.02	22
安分守己	7.08	6.79	0.02	23
信用	8.40	8.07	0.02	24
博学 (学识)	7.74	7.46	0.02	25
无争	5.52	5.33	0.02	26
宽容	7.32	7.10	0.02	27
廉洁	7.62	7.40	0.01	28
中庸之道	6.33	6.16	0.01	29
耐心	7.87	7.68	0.01	30
知己之交	7.50	7.38	0.01	31
稳重	7.39	7.28	0.01	32
清高	5.36	5.32	0.00	33
忠于上司	6.42	6.41	0.00	34
保守	5.43	5.44	0.00	35
谦虚	7.20	7.28	-0.01	36
诚恳	7.68	7.84	-0.01	37
随和	6.88	7.13	-0.02	38
仁爱宽恕	7.41	7.81	-0.03	39
要面子	4.84	5.50	-0.06	40

从整套量表的平均得分看，中国人得分为 7.08，美国人为 6.45，显示出总体上中国人对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认同要高于美国人。分题项来看，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重视的价值观主要体现为：第一，在家庭主义和等级秩序的价值观维度上的评分高于美国人。例如，中国人在“孝”和“爱国”这两个题项的评分比美国人高 2.4 分以上，对“尊卑有序”的评分比美国人高 2.3 分。第二，中国人在个人修养和品格方面的重视度也更高，显示出中国人更重视立身修德，相关题项有“贞洁”“羞耻感”“修养”“节俭”“清心寡欲”等维度。第三，中国人可能更加重视人际关系的回报性，体现为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威并施”“礼尚往来”等题项上中国人得分要明显高于美国人。最后，中国人也更加重视“耐力（毅力）”“勤劳”“团结”等体现长期主义的价值观。

虽然使用的是儒家价值观量表，但我们观察到中国人在一些价值观维度上的评分与美国人接近，甚至低于美国人。换言之，要么这些价值观非中国独有，要么当今中国人已不太重视这些价值观。表 1 显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均高度重视的价值观（7.5 分以上）包括信用、礼貌、耐心、诚恳；都不太重视的价值观（5.5 分以下）包括清高、保守、要面子。在“谦虚”“诚恳”“随和”“仁爱宽恕”等反映关系的和谐性的一些价值维度上，中国人的得分甚至还略低于美国人。

（二）中国人和美国人文化价值观的结构性差异

单一题项的价值观评分提供了对两国民众价值观差异的直观认识，但仍未能体现出文化价值观的结构性差异。40个题项仅为价值观的具体表征，其背后预设是存在一些潜在文化价值观的共性因子，对潜在因子的探索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对比文化价值观的结构性差异。经检验，Cronbach's α 为 0.933，KMO 值为 0.968，并通过了巴特利特球形检验（Bartlett test）；显示本文使用的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并适用进行因子分析。对此，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进行分析，经过因子旋转后，以 0.5 作为负载标准，保留了大于 1 的因子，最终从 40 个文化价值观题项中提取出 6 个价值观维度共可以解释总变异的约 50.14%。本文基于儒家文化和学者对中国人价值取向的讨论依次为其命名，具体如下：

中国人的第一个价值观维度由“孝”“忠于上司”“爱国”这三个因子负载而成，该维度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结构。杨国枢等认为家庭主义（familism）是中国人社会价值取向的首要维度，在儒家定义的“五伦”关系中有三种都属于家庭关系（父子、兄弟、夫妻）^①，可见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中国人将家庭的运作原则和关系逻辑延伸到在家庭之外的团体和组织，形成一个双层秩序的权威体系结构^②：在家庭和宗族秩序层面，形成以“孝”为核心和基础的价值观，在国家政治秩序层面则体现为“忠”。忠和孝的价值观提供了处理个人与家庭、国家的关系的行为规范。家庭主义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为家族自豪感，延伸到国家层面表现为“爱国”^③，因此本文将第一个价值观维度命名为“忠孝观”。

第二个价值观维度主要是由“恩威并施”和“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两个因子负载而成。儒家定义的角色关系是对称且相互依存的共生系统，关系中每一方都被期望按照既定规范履行角色，对应角色之间存在互惠互依的关系。^④ 翟学伟认为这集中体现为“报”的观念，它触及中国人关系运作和行为逻辑的核心，其运作机制迥异于西方交换论：首先，“报”的行为是特殊主义的，即在一个封闭性系统内发生，可以寻求到一个“明白无误、有所指望回报的对象”。其次，这种交换具有依附性特点：同一关系中的对应角色需要在“给”与“取”方面达成平衡才能建立彼此回报的规则。相较于西方强调的理性计算，“报”更多是一种义务性情理和“不得已为之”的心理压力，是“还人情债”，从而使交换双方不得不卷入到“报”的关系循环中。^⑤ 文崇一指出，中国人的回报规则还体现在根据别人的态度和行为确定自己对待其的方式，即“善必报，恶必惩”“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形成一种“报恩”与“报仇”的循环结构。^⑥ 在上述两个因子中，“恩威并施”体现出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即在关系中既给予下级庇护和恩惠，也施以威严，约束下级行动，表现出关系的相互性。“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则体现了人际交往中“报”的原则。这两个题项共同反映了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强调“给”与“取”的平衡和互惠互依，因此本文将其命名为“关系的回报性”。

第三个价值观维度是由“正义感”“廉洁”“诚恳”这三个文化因子负载而成。如前所述，儒家文化强调要以恰当行为做事，即要符合“义”，体现为中国人重视达成目标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儒家文化并不否认正当的利益诉求，但社会资源的分配要遵循“义”的原则，即程序合法性，以此均衡和调节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这三个文化因子共同体现了对做事方式合法性及社会秩序的追求，因此将其命名为“正义性”。

第四个价值观维度是由“宽容”“随和”“谦虚”“仁爱宽恕”这四个文化因子构成，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礼”的概念。儒家文化强调和谐的关系取向，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性，认为人与人之间应维持自然和

① 参见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载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Cheng C. K., "Familism: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Forces*, 23, 1944, pp. 50-59.

② 周怡：《厚与薄：全球化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学术月刊》2022年第10期。

③ 翟学伟、屈勇：《中国人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的一致与冲突》，《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④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李亦园、杨国枢等主编：《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5年。

⑤ 翟学伟：《报的运作方位》，《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⑥ 文崇一：《报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载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

谐的状态，即“和合性”^①，表现为在人际交往中尽量回避冲突，对不和存在焦虑与恐惧^②。而达到和谐的方式是遵循“礼”，即行为要克制，待人要宽厚。上述四个因子体现出促进人际和谐的倾向，因此将其命名为“关系的和谐性”。

第五个价值观维度主要由一系列与个人修养和品格相关的因子所构建，包括“无争”“清高”“生活节俭”“安分守己”“保守”“要面子”“贞洁”“清心寡欲”，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君子之道”。其中既有一些较为保守的态度，如重视贞洁和要面子，也包括对纪律的要求。儒家文化重视修身，对“己”的概念区别于西方的自我表达，而是为最大程度履行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③，为此，在日常生活中要“克己复礼”“修身养性”。杨国枢将中国人的这一价值取向总结为他人取向（other-oriented）^④，即中国人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极易受他人影响，对他人意见、褒贬特别敏感和重视，为了给他人留下良好印象和创造声誉，在日常生活中高度自我检视，注重自我约束和修养。对“己”的高度检视也与“面子”有关，“要面子”更多代表其背后的家庭和群体，强调成员的共同责任感和命运感。总之，该维度反映出中国人重视日常交往中对自己形象的高度整饬和管理。因此被命名为“自我修养”。

第六个维度是由“博学”“稳重”“耐力（毅力）”“耐心”“适应环境”“小心谨慎”几个文化因子负载而成，体现了儒家文化中“智”的概念。其中，博学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于教育的重视；“耐心”“耐力”“稳重”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做事心态的要求，如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的韧性、做事要有恒心；“适应环境”体现了要顺应潮流、审时度势；“谨慎小心”体现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兢兢业业的处事态度。这一维度被霍夫斯泰德总结为儒家伦理的长期主义（long-term orientation），即关注现在对未来生活的长远影响，为了细水长流而积累智识，保持耐心和恒心、适应变化等。据此，这一因子可被命名为“长期主义”。

本文以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结构作为参照系，分别计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上述维度的得分。表 2 显示，当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取向存在显著差异性（ $p < 0.001$ ），这首先表现为中国人在忠孝观、关系回报性、合法性、自我修养以及长期主义这五个维度的得分均为正，而美国人得分均为负，表明中国人更为重视上述儒家传统价值观。具体而言，中国人最认可、同时也是中美差别最大的维度是忠孝观，中国人在这一维度上得分明显高于美国人（差值=1.197），其次是关系回报性，表明当代中国人也比美国人明显更重视人际关系间的互惠互依（差值=0.826）。中国人对这两个维度的认可度要高于对正义性、自我修养、长期主义这三个价值观维度的认可。中美民众价值观之差异还表现为关系和谐性这一维度上，美国人得分为正，中国人却是得分为负，这是六个维度中唯一的例外。这一方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对经济利益和实用主义的追逐导致“互惠”的基本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被僭越^⑤，削弱了和谐性的观念。另一方面，美国人对宽容、仁爱宽恕等价值上的重视也可能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传统有关。

表 2 中国和美国在中国价值观几个维度的分布^⑥

价值观维度	题项	中国人 均值（标准差）	美国人 均值（标准差）	均值差
忠孝观 （家庭主义）	孝			
	忠于上司	0.367 (0.609)	-0.830 (1.196)	1.197***
	爱国			
关系回报性	恩威并施	0.253 (0.808)	-0.573 (1.145)	0.826***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①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年。
 ② Bodde D., “Harmony and conflict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Wright AF.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New York: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53, pp. 19-80.
 ③ 沙莲香：《“己”的结构位置——对“己”的一种释义》，《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④ 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参见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Turner R. H., “The real self: From institution to impul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5), 1976, pp. 989-1016.
 ⑤ 阎云翔、徐大慰：《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民族学刊》2010 年第 2 期。
 ⑥ 由于篇幅所限，附表“中国人价值观维度的因子构成和负载”不在文本中呈现，如有需要，可联系编辑部获取。

续表2

价值观维度	题项	中国人 均值（标准差）	美国人 均值（标准差）	均值差
正义性	正义感			
	抵制腐败	0.125（0.935）	-0.282（1.080）	0.407***
	诚恳			
关系和谐性	宽容			
	随和	-0.034（0.919）	0.076（1.160）	-0.110***
	谦虚			
自我修养	仁爱宽恕			
	无争			
	清高			
	生活节俭			
	安分守己	0.123（0.907）	-0.278（1.136）	0.401***
	保守			
	要面子			
长期主义	贞洁			
	清心寡欲			
	博学			
	稳重			
	耐力（毅力）	0.103（0.885）	-0.234（1.194）	0.337***
	耐心			
	适应环境			
	谨慎小心			

注：T-test 双尾检验，*** p<0.001，** p<0.01，* p<0.05。

六、结论与讨论

“现代化变迁下人如何发生变迁”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社会中一个争议性问题在于长期引导中国人的儒家价值观是否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变，以及其是否仍是中西方民众心理上有明显区别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由于缺乏恰当测量工具，学界对此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以儒家价值观量表作为标尺，采集了中美跨文化数据，系统比较了当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差异，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首先，本文证实了儒家文化范式的重要维度仍被保留和继承，这体现在“忠孝观”“关系回报性”“正义性”“自我修养”“长期主义”这些层面上，这些价值观能在儒家“五常”的仁、义、礼、智中找到根源。这表明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仍保有独特性，与美国人相比呈现出明显差异。从而显示“趋同假设”在预测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上有局限性，启示我们对价值观变迁的思考应审视相关理论在不同价值观的适用性。不可否认，人类社会存在某些普适性价值观符合“趋同假设”的预测，比如在性别平等、普遍信任等现代价值观方面中国人确有不同程度的提升。^① 但中国人的价值观仍保有其文化独特性，如家族取向（“忠孝观”）、关系取向（“关系回报性”）、他人取向（“自我修养”）等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部分也依旧稳固。可见，趋同假设的经济决定论和单向预测假设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价值观变迁，中国的现代化与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融合与继承关系，并非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

其次，本文也发现儒家文化的某些维度可能随社会变迁逐步削弱，这体现在“关系和谐性”维度上中国人得分低于美国人。对此有两方面解释：一是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引入的竞争性、逐利性，使中国人对关系的回报性需求有所提升，而对关系的情感性需求有所降低，导致对和谐性的价值强调不足。这一发现与近期研究结论相符，即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利他行为有所降低。^② 另外，也可能是美国仍保有较强的基督宗教传统，教义强调信徒要平等仁爱，导致在这一维度上美国人得分反而比中国人要高。

① 吴愈晓、王金水、王旭洋：《中国性别角色观念变迁（1990—2018）：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及性别差异模式》，《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齐亚强、张子馨：《转型社会中人际信任及其变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2期。
② 阎云翔、徐大慰：《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民族学刊》2010年第2期。

综上,本文认为应重视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变迁研究的重要性的价值。在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观变迁时,传统和现代不应简单视为旧与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传统价值观不应置于现代价值观的对立一端,而应视作一套单独体系来研究它在现代化变迁中的发展演变及与现代价值观间的相互影响。正如杨国枢所指出,“一个中国的现代人,会是从自己的传统人演变而来的,是适应自己的社会变迁的,而这一变迁或许与发达国家社会文化变迁的趋向相一致,或许会有所不同”。^① 本研究尝试了对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传统价值观体系的单独探索,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探索传统和现代价值观间的互动关系。

这也启发我们在研究中国人的行为轨迹时应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将之视作理解中国社会现象的核心要素之一。例如,中国人代际同住和代际支持的普遍性不完全是由经济因素等现实条件决定,家庭主义价值或忠孝观提供了代际关系模式的心理基础;经济活动中的走关系、请托行为并非是缺少替代性选择,而是与中国人对关系回报性的认识有关;中国各阶层普遍重视子女教育、能够吃苦耐劳,这有儒家长期主义价值理念的根源;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情感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最后,本文认为文化研究不应是纯粹思辨的,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差别需通过严谨科学的量化工具来测量和验证。不同于以往使用基于西方文化的量表,本文探索性使用了基于中国本土化概念开发的测量工具,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参照系进行跨文化比较。延续中国文化链团队的工作,本文采集了更具代表性、更大规模的跨文化数据,并展示了量化工具对探索中国人价值观独特性的重要意义。此外,尽管采集美国数据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较大的跨文化群体进行对比,但我们仍期待在日后的研究中将样本拓展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我们也期待之后可以进一步开发、完善和更新本土测量工具,采集和积累历时性数据,以探索中国民众价值观的长期变迁。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调查发展进程、经验与展望研究”(20JZD032)的阶段性成果。谢宇教授对本文的研究设计和写作思路亦有贡献,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朱颖)

The Confucian Cultural Paradigm

——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U. S.

YANG Yichun, ZHANG Chunni, SUN Yan

Abstract: The divergence in valu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s a prominent subject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Modernization theory posits that traditional values in diverse countries will be supplanted by shared modern values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leading to a convergence of values. However,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indigenous psychology underscore 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al paradigm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mid modernization. Previous research on Chinese values has often leaned o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measurement tools employed in limited quantitative studies originated from research on Western societies. This article utilizes a set of survey tools designed to measure Confucian culture for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fucian val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s still prominently display significant Confucian orientations and cultural uniqueness. Simultaneously, certain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values have also exhibited signs of decline.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dvocating for an examination of shifts in Chinese values through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social values,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tools

^① 杨国枢:《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

创于 1957 年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期刊

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期刊

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权威期刊

全国中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期刊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重点项目资助期刊



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

